

三部门详解外贸稳增长——

在扩大开放中增强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李于阳



实减轻企业负担方面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旨在促进外贸的稳定。”王受文说,作为外贸发展的牵头部门,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加快细化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确保各项政策尽快落地。相信这些措施对于提振外贸企业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进出口的平稳增长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跨境电商试验区推进顺利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这项工作已经起步,开局顺利。”王受文介绍。浙江省已经公布了首批试点企业名单,提出了需要各个部门具体研究的78条制度创新的清单。他认为,制度创新是很必要的。比如在监管上,跨境电子商务特别是B2C和C2C的方式,量小批次多,一天成千上万个批次,怎么监管需要制度创新。再比如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怎么为其提供融资的便利,外汇结算怎么便利化,出口退税怎么解决,都需要制度创新。他透露,有关政策正在抓紧试点之中。杭州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将会在其他地方进行推广复制。

海关将建风控中心

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介绍,实现全国一体化通关,要设立一个全国海关的风险防控中心和全国海关的税收征管中心。通过实现集中的风险防控和税收的集中统一作业,让同一个企业在不同的海关面对统一的海关监管政策和要求,享受统一的通关便利待遇。也就是说,企业面对的将不再是具体的某一个海关,而是全国海关这个整体。

邹志武说,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14项监管创新措施已经向全国推广,会有更多企业享受到海关制度创新带来的便利。比如,“先港区、后报关”制度使企业通关时间普遍减少1天至2天。“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制度可以帮助企业最高一年节省150万元左右,通关时间普遍减少2个小时,有的达到48小时。

海关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部署也专门制定了落实措施,有些已经见到了成果。比如中欧铁路快线等,通过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有关国家海关的合作,简化了相关手续,降低了铁路运输成本。

四举措加快退税进度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汪康介绍,今年以来,国税总局采取四方面措施加快退税进度。一是实行了出口退税的分类管理,对纳税信誉比较好,税收遵从度比较高的一类企业,办理退税不需要提供纸质的出口退税凭证,电子信息核对无误的,在两天内办结退税手续。二是下放了出口退税的审批期限,将生产企业的出口退税部分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到县一级税务机关。三是全面实施了出口退税的规范化的流程,简化退税的审核审批程序。四是在部分地方实行了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的试点,对企业在退税过程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设置了一些咨询平台给企业回答,并通过短信和微信向企业提醒关键事项。

“这些措施从今年上半年执行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好的。”汪康介绍说,1至6月份,全国出口退税比去年同期增长12.4%,远远高于出口额的增长。下一步,税务总局将进一步细化完善各项加快出口退税的措施。

中经观点

今年以来,虽然进出口总体有所下降,但随着各项稳增长措施的落地,我国出口不但增幅比全球贸易大,而且呈现出结构优化的趋势,贸易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一些优势产品出口形势很好。据统计,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6%,一些高端制造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逆势上扬。这说明,技术过硬、产品过硬,竞争力就强,也同时提醒我们,扩大外贸要在优字上下功夫。

从面临的新形势考量,国际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产品的品质要求更高,我国只有顺应这种变化,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才能有更大作为。而且,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加重,“大进大出”的模式难以为继,在优字上下功夫、促成“优进优出”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已经刻不容缓。

在优字上下功夫,对出口而言,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对进口来说,就是从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情,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企业要把更多精力放到提高产品品质、转型升级上来,放到瞄准国际市场需求上来。人无我有是优,人有我优是优,适销对路也是优。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形势好,通讯、电力、机车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主要不在于别的,在于产品、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在于市场有需求。

支持优质装备和产能“走出去”,是在“优”字上下功夫的一个重点。目前,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很大,而我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产能有待进一步释放。支持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要清理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各种障碍,让企业放开手脚闯世界,使产业在国际同台竞争中不断升级。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

全年吸引外资将稳定增长

本报北京7月17日讯 记者李于阳、实习生王华玉报道: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有关数据。王受文说,今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达4200多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左右。而去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的增速只有2.2%。

会后,王受文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迅速,达到23%;吸收外资的占比也在提高,在63%左右。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中,房地产利用外资增速是下降的。王受文说,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得益于我国主动出台了一系列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措施。正在修改的“外资三法”中,《外国投资法》将会全面引进负面清单,全面引进“有限许可”加“全面报告”的管理体制。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在下降。王受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利用外资下降,而一些高端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则在上升,比如通讯设备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等。此外,他还介绍了两个可喜的变化。一个变化是跨国公司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比例提高,并购方式吸引外资达到了19%,而去年这个数据不到5%。以前外资来中国主要是绿地投资,即来买地、建房,现在则是对现有的企业进行并购。他认为,这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淘汰落后产能,也有助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个变化是跨国公司看中中国市场和中国的劳动力研发能力,对中国研发中心的投资增长也很迅速。今年上半年,研发领域吸收外资达到25.7亿美元,和去年相比增长了62.8%。

王受文表示,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复苏过程中,国际间的投资流动不如前几年那么快。去年,全球外资流入量在减少,中国也受到影响。但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且产业配套全面,基础设施建设完备,法律环境不断优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断提高,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所以从整体来看,今年全年吸引外资还将保持稳定增长。



图为山东枣庄市山亭区一家食品企业的员工在生产出口罐头产品。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1.53万亿元人民币,降6.9%,其中出口增0.9%;进口降15.5%。刘明摄(新华社发)

宏观经济分析应当“增密度”和“精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

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我们首先应当沉下心来,以超出以往的精力和和气力投入,走出一条“增密度”和“精细化”的新路子;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我们不仅要“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而后动,看清楚再下手”,而且要以此为基础,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在加强政策研究的“针对性”和操作反应的“及时性”上下功夫。

和被迫接受的成分各自占的比例如何?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分别是怎样一种情形?又有哪些是常态性的现象,哪些是短时的现象?如此等等。这些显然不是宏观经济分析工作中不可回答的,而是躲不开、绕不过,必须回答的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只有在此作出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有关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

再看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依照常识,经济形势越是趋于严峻,越是风云变幻,就越是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然而,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同样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除了上述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三个层面的变化是必须引入宏观调控视野的:

其一,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也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对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于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功能更齐全、作用更完整、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新判断,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必须与新常态相契合,建立在主动适应并引领新常态的基础之上。

其二,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对于形势判断的变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路也在发生变化,形成了宏观调控新理念。比如,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要交给市场;要主动做好政府该做的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保持一定经济增速,主要是为了保就业;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定力,向社会释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坚定信号;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保持基本稳定;要避免强刺激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等等。所以,鉴于建立在新形势、新判断基础上的治国理政思路已经发生变化,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必须同新的经济工作理念相对接,根据新理念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方法。

其三,宏观经济政策功能定位不仅指向逆周期调节,而且旨在推动结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选择也同时指向于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标。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将有限的宏观调控资源同时配置于双重作用和多重目标,从而难免使得以往的“歼灭战”演化为“阵地战”。这也意味着,我们难以依托的宏观调控空间变窄,从而难免使得宏观调控的操作目标或者着力点频繁调整。所以,即便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面亟待扩张方面加力增效,我们也必须在兼顾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

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标的前提下,围绕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个方面的功能作用,妥善安排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格局。

面对这一系列变化,应当坦承,当前极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很多方面是我们所不大熟悉的、凭借以往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经验难以做出清晰阐释的;还应当坦承,对于宏观调控的新路子,对于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新格局,我们尚不十分清晰。究竟该向何处调整并做怎样的改变,还需在不断探索中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应当确认,对于事关认识当前、规划未来意义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我们首先应当沉下心来,以超出以往的精力和和气力投入,走出一条“增密度”和“精细化”的新路子;还应当确认,对于事关当前稳增长政策成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我们不仅要“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而后动,看清楚再下手”,而且要以此为基础,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在加强政策研究的“针对性”和操作反应的“及时性”上下功夫。

总之,我们应当全面而适时地调整以往习以为常的理念、思维和做法,以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理念、思维和做法,推动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转型。以此为基础,全面构建适应并引领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分析工作新格局。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与以往相比变化很大。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我们沿袭已久的宏观经济分析工作格局。

先看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无论采用何种指标体系加以评估,也无论是就全球而论还是单就中国而言,进入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极大,绝对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它带给人们的总体感受是,国内外经济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扑朔迷离。而且,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叠加,其画面令人眼花缭乱。比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2007年的14.2%到2010年的10.4%,再到2014年的7.4%;又如,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速是21.3%,而2014年仅为8.6%。进入2015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增无减,财政收入增幅继续下滑。

应当说,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放缓或下滑,其本身并不足惧。因为,即使以这样的增速同当今世界其他经济体做横向比较,也算是高速度。况且,按照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加以分析,其中的有些成分还是我们一直想要的,算是乐见其成。当然,有些成分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属于被迫接受之列。有些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有些则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

问题在于,在总盘子中,乐见其成